



国家自豪感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 群体类型和忠诚度的调节作用

张智琦^{1,2,3}, 朱睿达^{1,2,3}, 刘超^{1,2,3*}

1. 北京师范大学认知神经科学与学习国家重点实验室暨IDG/麦戈文脑科学研究院, 北京 100875;

2. 北京师范大学脑与学习协同创新中心, 北京 100875;

3. 北京师范大学神经影像大数据与人脑连接组学北京市重点实验室, 北京 100875

* 联系人, E-mail: liuchao@bnu.edu.cn

2019-12-20 收稿, 2020-02-05 修回, 2020-02-05 接受, 2020-02-11 网络版发表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2017YFC080340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31871094)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9ZDA363)资助

摘要 集体自豪是个体由于本群体的成就或与外群体相比具有一定优越性而体验到的自豪感, 其核心是对本群体的认同。例如, 当我们都属于一个大群体“中国”的时候, 中国人的身份就成为了我们群体的身份象征。在我们不断加强的国家自豪感的宣传教育的过程中, 中国人本身对本群体和其他群体是更加“亲近”还是更加“排斥”? 本研究招募成年中国公民为参与者, 采用被试间设计, 将被试随机分为自豪、积极和中性启动组。实验1选用情绪图片作为启动材料, 采用独裁者游戏和最后通牒游戏范式测量个体的公平偏好; 实验2选用文本作为启动材料, 采用信任博弈游戏实验范式测量个体的人际信任。改变分配或投资对象为内群体(中国人)和外群体(外国人), 并按照《道德基础量表》中的忠诚分量表得分高低, 将被试分为高忠诚组 and 低忠诚组, 检验国家自豪对内外群体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和忠诚度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 高忠诚组的个体更容易产生内群体偏好。国家自豪启动能减弱内群体偏好, 并会增加高忠诚个体的公平偏好和人际信任。未来的研究可区分不同来源的国家自豪, 明确国家自豪的测量方式, 探究其他可能影响国家自豪对亲社会行为效应的人格变量, 并进一步研究国家自豪对亲社会行为影响的心理机制。

关键词 国家自豪, 亲社会行为, 公平偏好, 人际信任, 内群体偏好, 文化自信

自豪感(pride)在牛津英文词典中的定义为“因为自己或与自己有联系的人做出的成就而得到的深深的快乐或满足感”, 是一种重要的正性道德情绪^[1]。与个体自豪类似, 当自豪感的产生来源于群体的成功行为时, 就有了集体自豪感(collective pride)。Chakrabarti^[2]提出, 自豪感的主体为个体时为个人自豪(individual pride), 当来源为一个群体时感受到的自豪为集体自豪, 其中, 个体需要为群体的成员。也有学者提出, 集体自豪感是一种因所在群体取得成就或强于其他群体而产生的积极

情绪^[3]。

集体自豪的关键是身份标识的激发。Tajfel和Turner^[4]提出社会认同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 并认为个体能够认同自己是群体的一部分, 并把群体赋予他的意义和价值纳入自我的表征。而Mackie等人^[5]也提出群际情绪理论(intergroup emotions theory), 当个体对自己所在集体具有高归属感的时候, 就会产生强烈情感和价值附着, 把情绪从个人水平拓展到群体水平^[6,7], 并会因为群体处境而产生不同的情绪。当我们都属于

引用格式: 张智琦, 朱睿达, 刘超. 国家自豪感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 群体类型和忠诚度的调节作用. 科学通报, 2020, 65: 1956-1966

Zhang Z Q, Zhu R D, Liu C. What are the effects of national pride on prosocial behaviors? The moderating influences of group type and loyalty (in Chinese). Chin Sci Bull, 2020, 65: 1956-1966, doi: 10.1360/TB-2019-0687

一个大集体“中国人”的时候,中国人的身份就成为了我们群体的身份象征,此时的集体自豪也可称为国家自豪(national pride)。

亲社会行为是指人们在社会交往中表现出的有社会责任感的、有益于他人和社会的行为,包括合作、分享、谦让、帮助等^[8]。自我意识情绪是亲社会行为重要的前因变量^[9],并且可以通过反馈影响个体的行为倾向^[10],而自豪作为一种正性自我意识情绪,也有相关研究支持自豪和亲社会行为之间具有关联。Dorfman等人^[11]研究了社会困境中的合作行为,并检验了自豪感在合作行为中的作用,结果发现,自豪的启动比单纯激发愉悦情感更能够增加合作行为。Costello等人^[12]探究了一个社区339人的精神病性、自豪、亲社会行为和反社会行为等变量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以自我为中性的冲动型与真实自豪负相关,与自大自豪正相关,且真实自豪中介了恐惧支配和亲社会行为的结果变量。集体层面的自豪感也与亲社会行为有关,Leeuwen等人^[13]检验了集体自豪和集体内疚能否激发个体对于弱势群体的帮助,并检验了身份认同在其中的调节作用。发现高身份认同的个体,集体自豪启动比内疚启动条件下,对外群体有更多共情,也更愿意帮助外群体。

集体自豪感是依赖于特定群体而产生的。那么,在面对不同的群体时,集体自豪感可能会产生不同的行为模式。正如前文所说,身份标识的激发是引发国家自豪体验的关键,但是引入身份标识也同时会带来内群体偏好(ingroup preference)。然而现在还不清楚,当区分内群体和外群体,强化亲社会行为中的身份标识,国家自豪感启动下的个体的是否会对不同分配对象的亲社会行为存在差异,并呈现内群体偏好。一方面,国家自豪感可能增强内群体偏好,增大对内外群体亲社会行为的差异。国家自豪感会增强个体与内群体的连接感,同时会削弱个体与外群体的连接感,增加与外群体的竞争意识,因而会降低对外群体的亲社会行为。例如,张莹瑞和佐斌^[14]探讨了中华民族认同、国家自豪感与内群体偏好的关系,发现中华民族认同与国家自豪感和内群体偏好有显著的正相关,中华民族认同和国家自豪感对内群体偏好有显著预测效果。但是另一方面,国家自豪感总体上是积极情绪^[6],根据积极情绪的建构理论(broaden and build theory)认为,积极的情绪可能通过产生一种“社会拓宽”的状态来建立资源^[15]。在这种状态中,个体更重视与他人的合作互惠,从而增加助人行为,积极情绪还能增加个体的情绪共情^[16]。特别

地,集体层面的自豪可能会让个体觉得自己所在群体的实力已经足够强大,于是愿意分配给外群体更多的财富。所以启动国家自豪后,个体到底会怎样对待自己所在群体成员与外群体的成员?这是一个有待探究的问题。

而个体对所在群体的忠诚度在其中可能起着调节作用。经典的道德基础理论(moral foundations theory, MFT)认为,在大多数文化下道德判断存在5个维度:关怀/伤害、公平/欺骗、忠诚/背叛、权威/颠覆和纯洁/堕落^[17],其中忠诚/背叛维度强调了个体对所在团体的责任和团体内部的约束力^[18]。高忠诚度表示和内群体有更强的连接,更加认同所在群体,因而可能内群体偏好更强,以往研究也证实忠诚启动会增强内群体偏好^[19]。所以启动集体自豪对个体对待不同群体做出的亲社会行为也可能受个体忠诚度的调节作用,在高低忠诚群体中存在效应差异。

亲社会行为内涵广泛,本研究选取公平偏好和人际信任两种表现对亲社会行为进行研究,常用的测量实验室中亲社会行为的范式为博弈任务。在这些任务中被试经常会违背个体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假设,做出有利于他人的亲社会行为^[20]。本研究包含两个实验,其中实验1以图片作为启动材料,采用改编的独裁者游戏(dictator game, DG)和最后通牒游戏范式(ultimatum game, UG),被试的角色为分配者。实验2以短文为情绪启动材料,采用改编的信任博弈游戏范式(trust game, TG),被试的角色为投资者。改变分配或投资对象为内群体(中国人)和外群体(外国人),检验不同情绪启动(国家自豪、积极情绪、中性对照)对个体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在当今社会,无论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积累,还是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扬,国家自豪都会成为其中的不竭动力。国家自豪感对于以不同群体(内群体、外群体)为接受对象的亲社会行为影响究竟会怎样,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问题。

1 实验1: 国家自豪启动对公平偏好的影响

1.1 实验目的

以图片为情绪启动材料,采用改编的独裁者范式和最后通牒游戏范式,探究国家自豪启动、积极情绪启动和中性对照3个条件下:(1)个体分配额度是否有差异。(2)个体是否展现出内群体偏好。(3)不同忠诚组的个体的内群体偏好程度是否有差异。

1.2 方法

1.2.1 被试

采用在线网络实验,通过Qualtrics(<https://www.qualtrics.com>)招募高校大学生为被试。回收问卷240份,筛选排除填写时间长和没有完整作答的问卷后,有效数据223人,男生83人,女生140人,平均年龄21.41岁($SD=1.88$)。自豪启动组69人,积极启动组80人,中性启动组74人。

1.2.2 实验材料

(1) 情绪诱发材料。实验材料示例如图1,国家自豪启动组采用网络上收集的图片,积极启动组和中性组图片来源为国际情绪图片库(IAPS),每组各20张,格式为JPG,分辨率为800×500像素。邀请心理学专业同学42名对3组图片的愉悦感和自豪感进行1~7的评分,1为“非常少”,7为“非常多”。筛选标准为自豪和积极的图片材料的积极评分匹配,积极和中性的图片材料在自豪评分上匹配。最终筛选了每组12张启动图片作为正式实验材料,分别对3组图片在自豪度和愉悦度上进行了检验,在自豪感维度上差异显著 $F(2,82)=96.975$, $P<0.001$,事后多重比较采用Bonferroni检验。结果发现,自豪组与积极组存在显著差异, $P<0.001$;自豪组与中性组存在显著差异, $P<0.001$;愉悦组和积极组不存在显著差异;3组图片在愉悦维度上差异显著, $F(2,82)=24.410$, $P<0.001$ 。事后多重比较采用Bonferroni检验,发现自豪组和积极组不存在显著差异, $P>0.05$;自豪组和中性组存在显著差异, $P<0.001$;积极组和中性组存在显著差异, $P<0.001$ 。

(2) 情绪测量工具。正性负性情绪量表(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scale, PANAS)^[21]。中文版的PANAS量表共20题,正性情绪和负性情绪各10道题,需要对20个情绪状态词进行1~5的评分。黄丽等人^[22]根据英文版量表进行编制翻译汉化,发现在中国人群中信效度良好。其中,积极情绪的自豪一题得分,作为本实验中自

豪情绪的指标。

(3) 忠诚的测量工具。采用Haidt道德基础问卷(the moral foundations questionnaire, MFQ)^[18]中的忠诚维度的两个分量表第一版由20个项目五因素构成,采用李克特7点量表计分。国内学者^[22,23]对该量表进行信度检验,证明信效度良好,后历经改进,在第四版中加入了道德参照分量表和道德判断分量表^[24]。本研究采用的是第四版MFQ两个分量表中忠诚/背叛维度的题目,共6道题,分量表1的问题为:“当区分对与错时,会多大程度上受下列因素的影响?”0为“毫不相关”,5为“绝对相关”。分量表2的问题为“阅读下面的表述后,请判断您同意与否”,0为“强烈反对”,5为“强烈同意”,分数越高表明个体越重视忠诚。本次实验中,两次实验的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s alpha)分别为0.651和0.581。

1.2.3 实验流程

实验1采用3(情绪启动组别:自豪、积极、中性)×2(分配对象国籍:中国、外国)的两因素混合实验设计。自变量为个体在独裁者游戏和最后通牒游戏中的分配额度。

实验1流程如图2,被试打开实验链接后阅读知情同意书,同意后方可进入实验。实验界面的指导语如下:“你好,欢迎来参加我们的研究!本实验是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的跨文化研究项目之一。这是一个关于决策的游戏,和你一起接受任务的参与者来自不同的国家,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你需要在几个决策游戏中做出决定,每个游戏中有2回合子游戏。在游戏中,你的收入以代币的形式计算。在任务结束后,这些代币将转化为现金,通过支付宝的形式发放给你。”

首先,给被试呈现3种博弈游戏的指导语,并做对应的理解测试题。被试通过理解测试后进入情绪启动阶段,每位被试被随机分配到自豪/积极/中性启动组,每组启动材料12张图片,每张图片呈现时间为3 s。被试看完图片后,立即进行情绪测量。之后,会开始正式决策游戏:包含独裁者游戏和最后通牒游戏各两回合,每



图1 (网络版彩色)实验1情绪启动材料(图片)示意图。(a)自豪组;(b)积极组;(c)中性组

Figure 1 (Color online) The priming pictures in Experiment 1. (a) The pride group; (b) the positive group; (c) the neutral group

表 1 独裁者游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M±SD)

Table 1 The descriptive statistics results of the dictator game (M±SD)

忠诚分组	启动材料分组	中国	外国	N
总	自豪	3.58±2.16	3.15±2.05	69
	积极	3.74±2.26	3.12±2.13	80
	中性	3.22±2.53	2.93±2.30	74
低忠诚组	自豪	3.48±2.61	3.27±2.61	34
	积极	3.63±2.26	3.20±1.98	35
	中性	3.02±2.41	2.90±2.54	42
高忠诚组	自豪	3.86±1.93	3.23±1.75	35
	积极	3.84±2.29	3.05±2.27	45
	中性	3.47±2.70	2.97±1.99	32

表 2 最后通牒游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M±SD)

Table 2 The descriptive statistics results of the ultimatum game (M±SD)

忠诚分组	启动材料分组	中国	外国	N
总	自豪	4.33±1.89	4.00±2.06	69
	积极	4.31±1.89	3.86±1.71	80
	中性	3.92±2.20	3.78±1.97	74
低忠诚组	自豪	3.94±2.26	3.60±2.42	34
	积极	4.23±1.65	4.11±1.62	35
	中性	3.80±2.31	3.78±2.24	42
高忠诚组	自豪	4.89±1.59	4.57±1.79	35
	积极	4.38±2.07	3.67±1.77	45
	中性	4.06±2.08	3.78±1.60	32

回合游戏中被试的角色都是分配者，初始额度为10个代币，分配对象分别为中国人和外国人，两回合顺序随机。决策游戏后，被试还需完成MFQ-30量表中的忠诚分量表，填写人口学信息。实验报酬根据被试决策游戏中的投资和分配额度换算进行发放。

1.2.4 数据处理

先采用SPSS 23.0对独裁者游戏和最后通牒游戏分配金额进行两因素混合方差分析，之后根据被试忠诚

量表的得分按从低到高排序，以中位数为分界点，将被试进行分半，计为低忠诚组和高忠诚组，再分别对每组被试进行两因素混合方差分析。

1.3 实验结果

1.3.1 情绪诱发的操作性检验

本实验中的自豪情绪采用PANAS量表的自豪题目分数，积极情绪采用所有积极题目的分数的平均值测量。对3组诱发的自豪情绪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 $F(2, 220)=21.060, P<0.001$ 。进一步多重比较结果显示：自豪组和积极组自豪得分存在显著差异， $P<0.001$ ；积极组和中性组不存在显著差异， $P>0.05$ ；自豪组和中性组存在显著差异， $P>0.05$ 。证明自豪情绪的启动是有效的。对3组诱发的积极情绪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3组自豪情绪得分存在显著差异， $F(2, 220)=3.290, P<0.05$ 。进一步的多重比较结果显示，自豪组和积极组愉悦得分不存在显著差异， $P=0.086$ ；积极和中性组自豪得分不存在显著差异， $P=0.07$ ；中性组和积极组自豪得分不存在显著差异， $P>0.05$ 。

1.3.2 独裁者游戏的结果

表1为实验1独裁者游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1) 情绪启动对于独裁者游戏的效应。两因素混合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图3(a)：分配对象的国籍主效应显著， $F(1, 220)=24.219, P<0.001, \eta^2=0.101$ ，当分配对象为外国人时，个体投资的代币数显著少于投资对象为中国人时候的代币数量，表现出内群体偏好；启动材料的分组主效应不显著。国籍和启动材料分组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F(2, 220)=1.219, P=0.298, \eta^2=0.011$ 。

简单效应检验，结果显示：当启动材料是自豪图片的时候，分配给中国人的显著高于分配给外国人的代币， $F=6.930, P=0.009$ ；当启动材料是积极图片的时候，分配给中国人的显著高于分配给外国人的代币， $F=16.990, P<0.001$ ；当启动材料是中性图片的时候，分配给中国人的略微高于分配给外国人的代币，差异边缘显著， $F=3.330, P=0.069$ 。

(2) 情绪启动对不同忠诚分组的独裁者游戏的效应。如图3(b)所示，对于低忠诚个体，两因素混合方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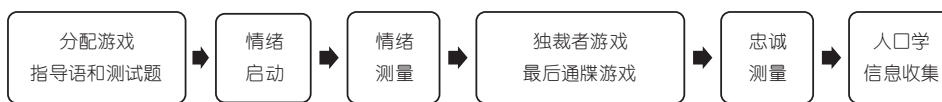


图 2 实验1的流程
Figure 2 The procedure of Experiment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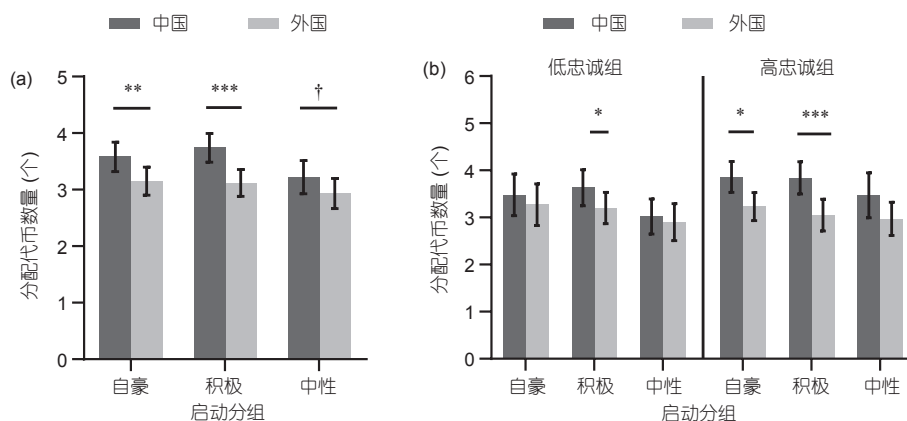


图3 独裁者游戏分配代币数量。(a) 3种情绪启动条件下分配; (b) 3种情绪启动条件下不同忠诚分组分配。*: $P<0.05$; **: $P<0.01$; ***: $P<0.001$; †: $P<0.1$

Figure 3 The distribution of tokens in the dictator game. (a) Under three priming conditions; (b) under three priming conditions by high and low loyal groups. *: $P<0.05$; **: $P<0.01$; ***: $P<0.001$; †: $P<0.1$

分析: 国籍主效应显著 $F(1,109)=6.146, P=0.015$, 出现内群体偏好, 个体分配给中国人的代币数量显著高于外国人; 分组主效应不显著, $F(2,109)=2.309, P=0.104$; 3种启动条件下分配代币的数量没有显著差异。国籍和分组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F(2,109)=0.807, P=0.449$ 。

简单效应检验, 结果显示: 发现只有在积极启动组中, 出现了内群体偏好的效应, $F=5.660, P=0.019$, 即启动积极情绪后, 低忠诚个体分给中国人的代币数量显著高于外国人的。

对于高忠诚个体, 两因素混合方差分析: 国籍主效应显著 $F(1,109)=18.157, P<0.001$, 投资给中国人的代币显著高于给外国人的代币。 分组主效应不显著, $F(2,109)=1.832, P=0.801$, 国籍和分组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著。 $F(2,109)=0.396, P=0.724$ 。

简单效应检验, 结果显示: 当启动材料是自豪图片的时候, 投资给中国人的显著高于投资给外国人的代币, $F=5.660, P=0.019$ 。当启动材料是积极图片的时候, 投资给中国人的显著高于投资给外国人的代币, $F=11.010, P=0.001$ 。当启动材料是中性图片的时候则不存在这种差异。

1.3.3 最后通牒游戏的结果

表2为实验1最后通牒游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1) 两因素混合方差分析。如图4(a)所示, 国籍主效应显著, $F(1,220)=13.184, P<0.001, \eta^2=0.054$, 个体分配给中国人的代币数量显著高于外国人, 表现出内群体偏好。启动材料分组主效应不显著, 国籍和启动材料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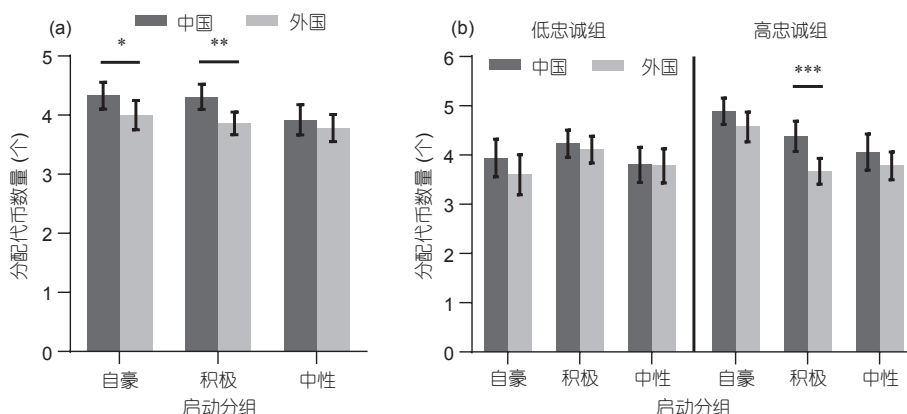


图4 最后通牒游戏分配代币数量。(a) 3种情绪启动条件下分配; (b) 3种情绪启动条件下不同忠诚分组分配。*: $P<0.05$; **: $P<0.01$; ***: $P<0.001$

Figure 4 The distribution of tokens in the ultimatum game. (a) Under three priming conditions; (b) under three priming conditions by high and low loyal groups. *: $P<0.05$; **: $P<0.01$; ***: $P<0.001$

组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P>0.05$ 。

简单效应检验, 结果显示: 当启动材料为自豪图片时, 个体分配给中国人的显著高于分配给外国人的代币, $F=4.860$, $P=0.029$ 。当启动材料为积极图片时, 个体分配给中国人的代币显著高于分配给外国人的代币, $F=10.260$, $P=0.002$ 。当启动材料为中性图片时, 则不存在这种差异。

(2) 情绪启动对不同忠诚分组的最后通牒游戏的效应。如图4(b)所示, 对于低忠诚个体, 国籍主效应不显著, $F(1,109)=1.939$, $P=0.167$, 国籍和分组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F(2,109)=0.679$, $P=0.509$, 分组主效应不显著, $F(2,109)=0.441$, $P=0.645$ 。

对于高忠诚个体, 国籍主效应显著 $F(1,109)=12.654$, $P=0.001$, 说明在高忠诚组中, 分配给中国人的代币数量显著高于分配给外国人的代币数量。分组主效应不显著, $F(2,109)=2.309$, $P=0.104$, 国籍和分组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F(2,109)=1.399$, $P=0.251$ 。简单效应结果显示: 积极启动条件下, 分配给中国人的显著高于分配给外国人的代币。 $F=13.840$, $P<0.001$ 。

1.4 小结

无论是独裁者游戏还是最后通牒游戏, 个体都呈现出了内群体偏好, 即, 当分配对象为内群体成员(中国人)的时候会更地将自己的一部分利益拿出给对方。在独裁者游戏中, 3个启动组的简单效应结果显示, 积极组的内群体偏好程度最大, 而国家自豪启动能够削弱这种内群体偏好。将被试按照忠诚分数进行高低分组, 发现两种博弈游戏中的高低忠诚组具有相似的趋势。相比于中性对照组, 国家自豪和积极启动的分配总额略高, 这也部分验证了积极情绪的建构理论。但积极启动会增大个体对自己和不同分配对象的分配差异, 自豪启动能够降低分配中的内群体偏好。

独裁者游戏和最后通牒游戏反映的是个体的公平偏好, 而人际交往中对他人的信任也是一种重要的亲社会行为。那么如果将启动材料改为文本, 并换用信任博弈游戏, 能否重复这种效应呢? 我们设计了实验2进行验证。

2 实验2: 自豪启动对人际信任的影响

2.1 实验目的

因为实验1的情绪启动材料为图片, 我们希望探究

自豪情绪对亲社会行为的效应是否在其他形式的情绪启动材料中也能验证。因此实验2以短文为情绪启动材料, 用改编的信任博弈游戏范式, 探究国家自豪启动、积极情绪启动和中性对照3个条件下: (1) 个体投资额度是否有差异。(2) 个体是否展现出内群体偏好。(3) 不同忠诚分组的个体的内群体偏好程度是否有差异。

2.2 方法

2.2.1 被试

与实验1类似, 通过Qualtrics(<https://www.qualtrics.com>)招募高校大学生为被试。筛选排除填写时间长、没有完整作答以及未通过理解测试题的问卷后, 删除不认真作答的被试后, 剩余183名被试, 平均年龄23.6岁($SD=3.50$)。自豪启动组63人, 积极启动组61人, 中性组59人。

2.2.2 实验材料

(1) 情绪诱发材料。自编情绪短文32篇、自豪组12篇、积极组10篇、中性组10篇, 字数在300~400字。招募31名评价者对实验材料进行3个维度的评价, 分别为情绪效价、情绪唤醒度、自豪感评价。李克特量表尺度为1~7, 数字越大代表越愉悦、兴奋、自豪。最后筛选出每组3篇短文。自豪启动组短文为《京杭大运河》《原创节目登陆戛纳》《都江堰》, 积极启动短文为《叶子与卷须》《河畔小屋》《无与伦比的优山美地谷》, 中性启动组短文为《日偏食》《石笋》《发酵茶》。各组短文字数K-S检验差异不显著。

(2) 测量工具。自豪感量表改编自Oveis等人^[25]的实验2, 共3道题目, 让个体用1~5的5点量表评价当前状态, 分别为“自豪的”、“满意的”、“有成就感的”。1代表“几乎没有”, 5代表“极其多”。自豪分数为3道题目得分的平均值。中文版正性负性情绪量表(PANAS): 同实验1。道德基础问卷(MFQ-30)忠诚分量表测量忠诚: 同实验1。

2.2.3 实验流程

与实验1类似。主要区别在于启动材料换为短文, 并采用信任博弈游戏对个体的亲社会行为进行测量, 个体投资的额度代表其对对方的信任程度。

2.2.4 数据处理

采用SPSS 23.0对信任博弈游戏的投资额度进行两因素混合方差分析。之后, 根据被试忠诚量表的得分按从低到高排序, 以中位数为分界点, 将被试进行分半, 计为低忠诚组和高忠诚组, 再分别对每组被试进行两

因素混合方差分析.

2.3 实验结果

2.3.1 情绪诱发的操作性检验

单因素被试间方差分析结果显示, 自豪情绪的分组效应不显著, $F(2,180)=0.867, P=0.422$, 积极情绪的分组效应不显著, $F(2,180)=0.250, P=0.779$, 消极情绪的分组效应边缘显著, $F(2,180)=2.930, P=0.056$. 多重比较Bonferroni校正结果显示, 自豪启动组和中性启动组的消极情绪差异边缘显著, $P=0.090$.

2.3.2 信任博弈游戏的结果

表3为实验2信任博弈游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1) 情绪启动对信任博弈游戏的效应. 如图5(a)所示, 国籍主效应不显著, $F(1,180)=1.286, P=0.258$, 无论投资对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 个体的投资额度都没有显著差别. 启动材料分组主效应不显著, $F(2,180)=2.145, P=0.120, \eta^2=0.02$; 国籍和启动材料分组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F(2,180)=0.775, P=0.462$. 简单效应检验结果3个启动组均无内群体偏好.

(2) 情绪启动对不同忠诚分组的信任博弈游戏的效应. 对于低忠诚个体, 国籍主效应不显著, $F(1,88)=0.008, P=0.930$, 分配对象的国籍对个体分配结果没有影响; 分组主效应不显著, 3个情绪启动组的分配没有差异, $F(2,88)=0.136, P=0.873$; 国籍和分组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F(2,88)=0.693, P=0.503$; 简单效应检验都不显著.

对于高忠诚个体, 国籍主效应边缘显著, $F(2,89)=3.396, P=0.069, \eta^2=0.037$, 个体会投资给中国人更多代币. 分组主效应显著, $F(2,89)=3.139, P=0.048, \eta^2=0.06$. 多重比较结果显示, 自豪启动下的个体比积极启动和

中性启动投资更多代币, $P=0.014$, 积极启动个体和中性启动个体投资代币数量没有差异. 国籍和分组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F(2,89)=0.356, P=0.701$. 简单效应检验: 积极启动条件下, 个体对内外群体成员的投资差异边缘显著, $P=0.075$, 个体投资给中国人的代币高于外国人, 自豪材料和中性材料启动条件下, 个体对内外群体成员的投资差异均不显著.

2.4 小结

实验2采用信任博弈游戏范式, 发现在国家自豪条件下, 个体投资额度略高于积极启动和中性对照条件, 证明启动国家自豪后可增加个体对于他人的信任. 将个体高低忠诚分组后, 发现对于高忠诚个体: (1) 出现内群体偏好, 当投资对象为中国人时, 个体投资代币的数量略有增加. (2) 积极启动下个体出现内群体偏好的趋势, 而自豪和中性启动下均没有表现出内群体偏好. (3) 启动国家自豪情绪后, 投资额度高于积极启动和中性对照组, 提升了个体对他人的信任, 但是对于低忠诚个体则没有这样的效应.

3 讨论

本研究采用了两个实验检验不同情绪启动(国家自豪、积极情绪、中性对照)条件下, 个体对内、外群体成员亲社会行为的影响. 实验1以情绪图片为启动材料, 采用独裁者游戏和最后通牒游戏范式, 发现在两种博弈游戏中, 个体都呈现出了内群体偏好, 对内群体成员更加公平, 且只在高忠诚个体中出现. 而积极组的内群体偏好程度最大, 而国家自豪能够削弱这种内群体偏好. 实验2换用文本材料作为情绪启动材料, 采用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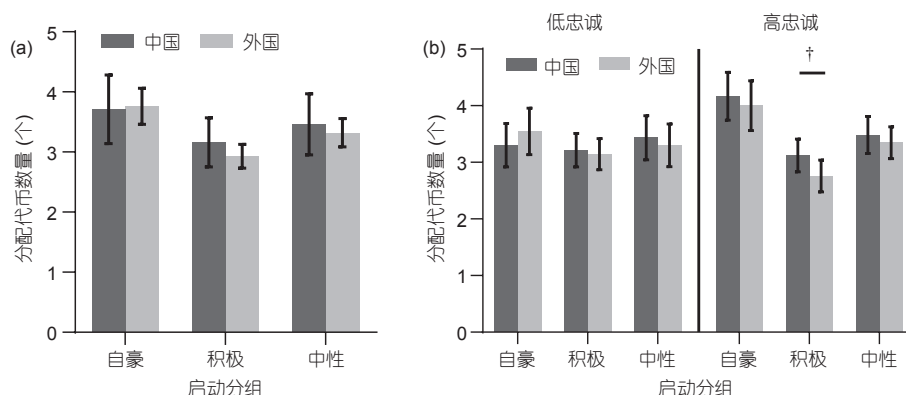


图5 信任游戏投资代币数量. (a) 3种情绪启动条件下投资; (b) 3种情绪启动条件下不同忠诚分组投资. †: $P<0.1$

Figure 5 The investment of tokens in the trust game. (a) Under three priming conditions; (b) under three priming conditions by high and low loyal groups. †: $P<0.1$

表 3 信任博弈游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M±SD)

Table 3 The descriptive statistics results of the trust game (M±SD)

忠诚分组	启动材料分组	中国	外国	N
总	自豪	3.71±2.27	3.76±2.37	63
	积极	3.16±1.60	2.93±1.55	61
	中性	3.46±1.95	3.32±1.80	59
低忠诚组	自豪	3.30±2.20	3.54±2.36	33
	积极	3.21±1.57	3.14±1.46	28
	中性	3.43±2.14	3.30±2.07	30
高忠诚组	自豪	4.16±2.31	4.00±2.41	30
	积极	3.12±1.65	2.76±1.62	33
	中性	3.48±1.77	3.34±1.52	29

信任博弈游戏范式,发现在国家自豪条件下,个体投资额度略高于积极启动和中性对照条件。在高忠诚个体中出现内群体偏好的趋势,而启动国家自豪情绪后,能够增加高忠诚个体对他人的信任,并缩小积极情绪带来的内群体偏好。

为什么积极情绪启动下,个体对于内群体(中国人)和外群体(外国人)之间分配和投资的额度差距会增大?在实验1中我们发现,积极启动条件下,个体会更加“偏好”内群体,增大了公平分配中内外群体的差异,这可能由于单纯诱发积极情绪对社会拓宽的作用是有限度的。由于在实验中被试扮演的是分配者的角色,在自我和另外一名虚拟玩家之间分配代币,集体自豪和积极情绪启动个体给他人的代币是略高于无情绪启动组的,这也证明了积极情绪下个体对待自我和他人会更加公平,从而间接支持积极情绪的建构理论,表明积极情绪在一定上确实模糊了个体与他人之间的界限。但可能单纯诱发积极情绪优先提升个体和内群体之间的相似程度感知。而启动自豪情绪后,个体才更多考虑自己所在群体与外群体之间的关系,进而又缩小了内群体偏好。

实验1中,在最后通牒游戏里,自豪和积极启动条件下高忠诚组的个体都增加了分配额度,表现得更加公平,验证了积极情绪的建构理论。两个子实验中积极启动会增大个体对不同分配对象的分配差异,对内群体更加公平,自豪启动能够降低分配中的内群体偏好。其原因可能是,启动国家自豪后,会让个体觉得自己所在群体的实力已经足够强大,对本国发展充满自信,于是愿意分配给外群体更多的财富。实验2中,信任博弈游戏是中投资者给代理人的投资额度,可反映投资者

对其的信任水平,投资越多则表示个体越信任代理人。国家自豪启动条件下,个体投资额度略高于积极启动和中性对照条件,而对于高忠诚个体,积极启动下个体出现内群体偏好的趋势,而自豪启动下削弱了这种内群体偏好,表明启动国家自豪后,个体对内外群体的信任差异不大。

国家自豪启动对两种亲社会行为影响的差异,其原因可能源于两种亲社会行为背后的心理机制存在差异。研究者一直试图通过各种理论模型阐释亲社会行为的产生机制。近年来,一些研究者提出社会偏好(social preferences)理论讨论了亲社会行为的动机,认为人们在做出决策的时候会同时考虑自我和他人的利益。社会偏好理论包括利他模型、强互惠模型和差异/不公平厌恶模型^[26]。其中,差异/不公平厌恶模型可解释人们的公平偏好,即,人们即使在自己为优势方时也对不公平情境有厌恶。单回合的最后通牒游戏和独裁者游戏结果反映的可能是情绪启动后对不公平厌恶的程度,个体相对处于优势和主动的一方,是主动的给予。而信任游戏个体作为投资者,期望对方返还,投资需要冒着被他人背叛的风险,仅仅是单回合的信任游戏仍会让被试做出谨慎的抉择。

4 存在的不足与未来展望

首先,国家自豪感的测量。因为现阶段集体层面自豪感的测量还缺乏比较成熟的量表,所以本实验选择直接询问被试主观的自豪感受的方式。由于情绪具有外显和内隐两种,未来可采用内隐联想测验(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 IAT)的范式,测量被试的内隐自豪。这种测验可以通过计算机的分类任务,测量概念词和属性词之间的联系程度,从而尽量减少自我表现和社会赞许性的作用。IAT作为一种测量内隐态度的工具,已经被广泛应用到心理学实验中^[27]。尽管自豪作为一种积极情绪,但仍可能受到社会赞许性的作用,并可能处于阈限下的无意识状态。这可能也是造成3个启动条件下操作性检验效应不佳的原因。所以,未来可以在实验室中测量被试内隐自豪,并与现在的外显自豪作对比。

另外,国家自豪感可能具有复杂性。Smith和Kim^[6]在两次国际社会调查项目数据(ISSP)中调查了一般自豪感和特殊领域国家自豪感,其中具体领域自豪感区分了政治、经济、科学、文化、历史等。吴鲁平等^[28]通过对ISSP的数据进行因素分析,将国家自豪感合并为政治自豪感和文化自豪感两个子成分,并发现

这两种子成分对个体对外接纳度影响不同,政治自豪感能正向预测个体对外接纳度,文化自豪感则负向预测个体对外接纳度.在本研究中,情绪诱发材料的内容并没有区分具体领域,如图片既有长城等文化历史的象征,又有辽宁舰等军事实力象征,有可能造成不同领域自豪之间出现混杂,未来可研究不同来源的国家自豪感对个体亲社会行为的作用是否存在差异.此外,正如个人层面的自豪存在双维度的真实自豪(authentic pride)和自大自豪(hubristic pride)^[9],有研究者也认为国家自豪也不是完全积极的,与参照标准有关.当来源为本国成就时,国家自豪为积极的,当自豪来源于与其他国家比较的过度竞争,国家自豪可能会转变为狭隘的傲慢^[29].所以,未来也可探究是否参照标准和诱发来源会产生不同强度和性质的国家自豪,进而影响个体对内外群体的态度和亲社会行为.

最后,本研究只测量了被试的忠诚得分并据此进行高低分组.忠诚度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包括情感、认知和行为等要素.集体认同是国家自豪的重要因素,更高的集体认同会带来更高的忠诚度^[30],当人们对自己的团队高度认同时,他们主要将自己视为团队成员.相反,当群体识别薄弱或缺失时,人们主要将自己视为独特的个体^[31].但是,国家忠诚和国家认同并不能完全等同.导致本实验中启动国家自豪感降低内群体偏好的心理机制尚不明晰,在未来研究中应测量个体的国家认同感,并检验其在国家自豪启动和内群体偏好之间

的调节作用.另外,可能国家自豪启动后降低内群体偏好的中介变量可能为共情, Leeuwen等人^[13]用描述本国积极抵抗纳粹的文本材料,诱发荷兰被试国家自豪情绪,发现在高群体认同组,自豪情绪能够预测被试对受害者的帮助行为.另外,自豪感还能增加个体对外群体的共情,而共情是增加亲社会行为重要因素之一.未来有待进一步明确国家自豪启动增加亲社会行为,降低内群体偏好的心理机制.自豪是一种重要的道德情绪,而集体层面的国家自豪感更是培养爱国主义情怀的重要方面,是一种从内而外的力量,当我们因祖国而自豪,那么爱国主义教育推进也会更加容易.在当今世界各国发展的时候,一个国家的民族凝聚力是这个国家的软实力之一,未来进一步探究国家自豪感的机制和作用,也有利于增强国家凝聚力,有利于中国人民更加自信和团结.

5 结论

本研究采用两个子实验,检验了国家自豪启动对个体公平偏好和人际信任的影响,并探究了忠诚度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自豪启动组和积极启动组分配或投资的额度略高于中性启动组.此外,高忠诚组的个体更容易产生内群体偏好.最后,国家自豪启动减弱能公平偏好和人际信任行为中的内群体偏好,并会增加高忠诚个体的亲社会行为,为集体自豪情绪与亲社会行为之间关系提供了证据.

参考文献

- 1 Chen Y H, Bai L, Li L F.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ment of moral emotion and its influence on moral behavior (in Chinese). *Stud Psychol Behav*, 2015, 13: 627-636 [陈英和, 白柳, 李龙凤. 道德情绪的特点、发展及其对行为的影响. *心理与行为研究*, 2015, 13: 627-636]
- 2 Chakrabarti A. Individual and collective pride. *Am Philos Quart*, 1992, 1: 35-43
- 3 Leeuwen E V. Restoring identity through outgroup helping: Beliefs about international aid in response to the December 2004 tsunami. *Eur J Soc Psychol*, 2007, 37: 661-671
- 4 Tajfel H, Turner J C. The social identity theory of intergroup behavior. *Psychol Intergroup R*, 1986, 13: 7-24
- 5 Mackie D M, Devos T, Smith E R. Intergroup emotions: Explaining offensive action tendencies in an intergroup context. *J Pers Soc Psychol*, 2000, 79: 602-616
- 6 Smith T W, Kim S. National prid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1995/96 and 2003/04. *Int J Publ Opin R*, 2006, 18: 127-136
- 7 Zhang Q, Feng J P, Wang E P. The classification of intergroup threat and the effect of threat on prejudice (in Chinese). *Adv Psychol Sci*, 2009, 17: 473-480 [张琦, 冯江平, 王二平. 群际威胁的分类及其对群体偏见的影响. *心理科学进展*, 2009, 17: 473-480]
- 8 Kou Y, Wang L. The review of researches about prosocial behaviors and intervene training in children (in Chinese). *Psychol Dev Ed*, 2003, 19: 86-91 [寇彧, 王磊. 儿童亲社会行为及其干预研究述评.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03, 19: 86-91]
- 9 Tracy J L, Robins R W. The psychological structure of pride: A tale of two facets. *J Pers Soc Psychol*, 2007, 92: 506-525
- 10 Tan W J, Wang Z Y, Meng W J. Moral emotions decade: Review and prospect (in Chinese). *Psychol Res*, 2012, 5: 3-7 [谭文娇, 王志艳, 孟维杰. 道德情绪研究十年: 回顾与展望. *心理研究*, 2012, 5: 3-7]
- 11 Dorfman A, Eyal T, Bereby-Meyer Y. Proud to cooperate: The consideration of pride promotes cooperation in a social dilemma. *J Exp Soc Psychol*, 2014, 55: 105-109

- 12 Costello T H, Unterberger A, Watts A L, et al. Psychopathy and pride: Testing Lykken's hypothesis regarding the implications of fearlessness for prosocial and antisocial behavior. *Front Psychol*, 2018, 9: 185
- 13 Leeuwen E V, Dijk W V, Kaynak Ü. Of saints and sinners: How appeals to collective pride and guilt affect outgroup helping. *Group Process Intergr Relat*, 2013, 16: 781–796
- 14 Zhang Y R, Zuo B.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nation identity and national pride, in-group favoritism of adolescents (in Chinese). *China J Health Psychol*, 2012, 20: 86–88 [张莹瑞, 佐斌. 青少年中华民族认同、国家自豪感与内群体偏好的关系.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012, 20: 86–88]
- 15 Fredrickson B L. The role of positive emotions in positive psychology: The broaden-and-build theory of positive emotions. *Am Psychol*, 2004, 359: 1367–1377
- 16 Eisenberg N. Emotion, regulation, and moral development. *Annu Rev Psychol*, 2000, 51: 665–697
- 17 Haidt J, Graham J. When morality opposes justice: Conservatives have moral intuitions that liberals may not recognize. *Soc Justice Res*, 2007, 20: 98–116
- 18 Graham J, Nosek B A, Haidt J, et al. Mapping the moral domain. *J Pers Soc Psychol*, 2011, 28: 968–969
- 19 Zogmaister C, Arcuri L, Castelli L. The impact of loyalty and equality on implicit ingroup favoritism. *Group Process Intergr Relat*, 2008, 11: 493–512
- 20 Wang J, Xie H, Zhang D D. The underlying neural mechanisms of three kinds of prosocial behaviors: Fairness, cooperation and trust (in Chinese). *Psychol Commun*, 2019, 2: 124–131 [王驹, 谢慧, 张丹丹. 公平、合作与信任3种亲社会行为的认知神经机制. *心理学通讯*, 2019, 2: 124–131]
- 21 Crawford J R, Henry J D.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schedule (PANAS): Construct validity, measurement properties and normative data in a large non-clinical sample. *Brit J Clin Psychol*, 2011, 43: 245–265
- 22 Huang L, Yang T Z, Ji Z M. Applicability of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scale in Chinese (in Chinese). *Chin Mental Health*, 2003, 17: 54–56 [黄丽, 杨廷忠, 季忠民. 正性负性情绪量表的中国人群众适用性研究.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03, 17: 54–56]
- 23 Cha X K. The Effect of moral failure on moral judge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ral foundations theory (in Chinese). Master Dissertation. Hangzhou: Zhejiang University, 2013 [查晓坤. 道德基础理论视角下道德失败对道德判断的特异性影响. 硕士学位论文. 杭州: 浙江大学, 2013]
- 24 Le Q X, Dong S H, Wang X T, et al.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model of moral motives scale in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in Chinese). *Chin J Clin Psychol*, 2019, 27: 263–267, 236 [乐清新, 董圣鸿, 王小桃, 等. 趋避道德动机量表在中国大学生中的信效度检验.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9, 27: 263–267, 236]
- 25 Oveis C, Horberg E J, Keltner D. Compassion, pride, and social intuitions of self-other similarity. *J Pers Soc Psychol*, 2010, 98: 618–630
- 26 Fehr E, Camerer C F. Social neuroeconomics: The neural circuitry of social preferences. *Trends Cogn Sci*, 2007, 11: 419–427
- 27 Jia F Q, Feng C Z. The control ability of the implicitness of IAT (in Chinese). *Psychol Sci*, 2012, (4): 799–805 [贾凤芹, 冯成志. 内隐联想测验“内隐性”的可控性研究. *心理科学*, 2012, (4): 799–805]
- 28 Wu L P, Liu H H, Wang J. A study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itizen national identity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foreign acceptance——Evidence from ISSP (in Chinese). *Int Soc Sci*, 2010, 27: 46–66, 4 [吴鲁平, 刘涵慧, 王静. 公民国家认同的特点及其与对外接纳度的关系研究——来自ISSP (2003)的证据. *国际社会科学杂志*, 2010, 27: 46–66, 4]
- 29 de Figueiredo R J P, Elkins Z. Are patriots bigots? An inquiry into the vices of in-group pride. *Am J Polit Sci*, 2003, 47: 171–188
- 30 Zdaniuk B, Levine J M. Group loyalty: Impact of members' identification and contributions. *J Exp Soc Psychol*, 2001, 37: 502–509
- 31 Van Vugt M, Hart C M. Social identity as social glue: The origins of group loyalty. *J Pers Soc Psychol*, 2004, 86: 585–598

Summary for “国家自豪感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群体类型和忠诚度的调节作用”

What are the effects of national pride on prosocial behaviors? The moderating influences of group type and loyalty

Zhiqi Zhang^{1,2,3}, Ruida Zhu^{1,2,3} & Chao Liu^{1,2,3*}

¹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Cognitive Neuroscience and Learning & IDG/McGovern Institute for Brain Research,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² Center for Collaboration and Innovation in Brain and Learning Sciences,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³ Beijing Key Laboratory of Brain Imaging and Connectomics,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liuchao@bnu.edu.cn

Pride, according to the Oxford Advanced American Dictionary, is defined as “feeling of pleasure or satisfaction that people experience when they, or others with whom they are connected, have achieved a venerated accomplishment or own something that others admire”.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and positive moral emotion. Previous studies have found that pride is related to prosocial behaviors. In recent years, scholars have focused increasingly on collective pride, which is a phenomenon experienced by an individual due to the achievements of their in-group or arising from a sense of superiority over those of out-groups. For example, for all those belonging to the “Chinese” nationality, this identity has become a status symbol for this group. When it comes to accumulating social cohesion among people, or carrying on one’s traditional culture, one can never overemphasize the importance of national pride. However, the effects of national pride on prosocial behaviors remain unknown. The question then arises, are people more inclusive or exclusive to members of other groups with the increasing patriotic-based education in China? There are certain economic games that are typical paradigms used to measure prosocial behaviors, which were then adopted by this study for data collection. This research recruited adult Chinese citizens for its participants. In Experiment 1, we utilized emotional pictures as priming materials, with the Dictator and Ultimatum Games used as measuring paradigms. For Experiment 2, we used texts and the Trust Game to measure the prosocial behaviors enacted towards in-group (Chinese) versus out-group members (non-Chinese). We then used a between-subject design and divided the participants into three priming groups. From there, we measured their national loyalty using the loyalty subscale of The Moral Foundations Questionnaire and divided them into either the high or the low loyalty group, according to their scor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dividuals in the high loyalty group were more likely to experience an intragroup preference. Furthermore, national pride priming weakened participants’ in-group preferences and increased the degree of fairness and trust experienced among high loyalty people. In summary, our study provides evidence that group-level pride is related to prosociality. Future studies may discriminate national pride from that arising from different sources, use other materials that trigger national pride, identify more reliable measurements of national pride, and explore other personality traits that may influence the effects of national pride on prosocial behaviors. To expand upon this research, more studies must be carried ou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mechanism of influence of national pride on peoples’ prosocial behaviors.

national pride, prosocial behaviors, fairness preference, interpersonal trust, in-group bias, cultural confidence

doi: 10.1360/TB-2019-0687